

·新 论·

纪念毛泽东：一位解放教育学的先驱

王洪才,解德渤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解放教育学是 20 世纪最具有影响的教育思想之一,它主张教育即政治、教育即人性解放,开创了以行动为特色的教育思想。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一生致力于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民众解放、民族解放和所有受压迫人民解放等教育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教育思想内涵,也奠定了他在解放教育学发展史上的先驱地位。解放教育学的开创者、巴西教育家弗莱雷从毛泽东教育思想中吸收了大量营养。揭示毛泽东对解放教育学的贡献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也有助于更好地纪念这位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世纪伟人。

关键词: 解放教育学;毛泽东;弗莱雷;先驱

中图分类号: G40-0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059(2013)06-0005-07

In Memory of Mao Zedong: A Pioneer in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for Liberation

WANG Hong-cai, XIE De-bo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er,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for Liber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ought in the 20th century, which claims that education is one kind of politics, and that education is for human liberation. Mao Zedong, as Chinese nation's great leader, contributed his whole life to individuality liberation, female liberation, mass liberation,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liberation for the oppressed, which made him a pioneer in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for Liberation. Paulo Freire, the founder of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for Liberation, had drawn on Mao's educational thought. Research on Mao's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for Liberation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Mao's thought in memory of this great man.

Key words: Liberation Education; Mao Zedong; Paulo Freire; Pioneer

今年,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毛泽东不仅在政治、军事、哲学方面贡献卓越,而且在文化教育上贡献也独具一格。历史不强求每一位政治人物都具有教育思想家的才华,可历史更钦佩一位伟人具有独领风骚的教育手笔。^[1]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历史人物。美国学者约翰·霍金斯(John N. Hawkins)评价道:“毛泽东一生对于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对教育的关心在许多大政治家家中都是独树一帜的。要想了解中国现代教育,就无法离开对毛泽东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了解。”^[2]概括起来,毛泽东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他对解放教育学的贡献上,他是当之无愧的解放教育学先驱。

一、解放教育学的基本旨趣

人类历史同时也是人类解放(自由)的历史。^[3]解放教育学所关注的人性解放问题,也是古希腊博雅教育、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人文主义所关注的主题。而解放教育学真正成为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教育理论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1921-1997 年)的《被压迫者教育学》的问世为标志。弗莱雷被美国著名左派知识分子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看作“自赫尔巴特、杜威以来,教育理论史上‘第三次革命’的开创者和实施者”。弗莱雷提出了“教育即解放”的观点,诠释了

“解放是一种行动”的见解,提出了“教育即政治”的主张,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解放教育理论。其核心观点如下:

(一)人性化——教育走向解放的哲学立脚点

尽管从时间上看,弗莱雷在后期才提出了“教育即政治”的主张,但在理论逻辑上,它是解放教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这是其人性观的反映。“从价值论观点看,人性化问题一直是人类的中心问题”。^{[4]1}“非人性化是对成为更完善的人的某种扭曲,人性不完美迟早会导致被压迫者起来,与那些使他们变得不完美的人作斗争”。^{[4]1}由此,弗莱雷赋予人性发展以解放的内涵。基于这种人性观,弗莱雷将压迫的本质归结为“主体客体化”。^[5]解放就是要突破黑格尔所谓的“主奴结构”的历史循环,^[6]从而达致一种民主平等的“主体间性”。但弗莱雷将“解放”的起点与终结的承诺都诉诸于人性的普遍觉醒。^[7]

弗莱雷指出,“教育的全部活动在本质上都是政治的。政治不是教或学的某一个方面。不管教师和学生是否承认他们的工作和学习的政治性,教育的所有形式都是政治的。”^[8]弗莱雷看到了教育的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功能,这与批判教育学观点颇为相似,但以美国阿普尔为代表的批判教育论者陷入了悲观主义,而弗莱雷则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将教育作为挑战现实压迫与不公正秩序的利器,从而他的解放教育学也被称为“希望教育学”。

(二)批判意识——教育走向解放的根本出发点

解放教育就是被压迫者的教育,就是被压迫者意识到自己被压迫的现实,在弗莱雷那里称为“觉悟”,即不断反思自己对于压迫者的依附态度,克服因受压迫而产生的压迫“欲望”^①,进而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联合斗争以挣脱束缚的枷锁。^{[9]130}在弗莱雷看来,批判——觉悟——行动——解放,是一个连贯的、相融的社会历史的过程。

弗莱雷将觉悟看作是一种历史的介入。他认为:“没有历史的介入,也就没有觉悟。因而,觉悟是一种历史性意识,是批判地介入历史。”^[10]进而言之,在介入历史行动之前以及过程之中,解放的行动离不开批判性意识。那么,我们需要在两方面时刻保持批判性的反思精神:其一为受被压迫的社会现实、深层制度与结构;其二为被压迫者的人性二重性。所谓的被压迫者的人性二重性就是,“对自由既向往又惧怕,对权力既怨恨又执迷”。^[11]因为被压迫者“他们同时既是自身又是内化了压迫者意识的压迫者”。^{[4]5}因此,解放的教育就是觉悟的教育,就是具有批判性意识的教育,一种怀有挑战传统社会秩序抱负的教育。

(三)提问式教育——教育走向解放的核心关注点

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中对传统教育模式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讲解把学生变成了‘容器’,变成了可任由教师‘灌输’的‘存储器’……于是,教育就变成了一种存储行为。学生是保管人,教师是储户。”^{[4]24-25}这种“储蓄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潜在预设是:教师是无所不知的,学生是绝对的无知者,将知识看作是教师对学生的一种恩泽,从而灌输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同时灌输式教育也获得了其存在的合法化基础。这种教育方式脱离了学生经验与现实情境,从而变成了“冠冕堂皇的言辞,而不具有改造的力量”。^{[4]24}受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影响,弗莱雷认为,传统教育将被内化了的压迫者意识完全“物化”,使得师生关系紧张甚至趋于对立,教育活动也变成了死气沉沉、可有可无的可怜之物。

在猛烈批判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弗莱雷提出通过“提问式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改变受压迫的现实。与“储蓄式教育”不同,“提问式教育”是建立在民主、平等基础上的互动交流,而不是垂直式的命令。这种教学方式打破了传统教育对知识的认知,也祛除了教育对静态知识的迷恋,从而砸碎了压迫者权威意识作祟的美梦,最终将学生从被压迫的客体转变为自我解放的主体。弗莱雷指出,“真正的思考,即是对现实的思考,不是发生在孤立的象牙塔中,而只能通过交流才能产生。”^{[4]28-29}

(四)反思性行动——教育走向解放的归宿点

尽管弗莱雷是一个基督教徒,但他极不赞同依靠上帝来获得拯救。他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神学,获得幸福是我们的目标。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要获取,而不是永远地等待。”^{[9]112}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影响下,弗莱雷认为“解放是一种实践:是人民为了改造世界而对世界采取的行动和反思”。^{[4]30}其中行动和反思是密不可分的,行动之中包含着反思,反思中孕育着行动,而且带有批判性质的反思本身也是一种行动。^{[4]73}在这一过程中,革命领袖只有与人民一道,通过“合作、团结、组织和文化合成”,^{[4]102-115}真正的政治解放才可以得以实现。

总体而言,解放教育不仅是一种反对压迫的教育理论,也是一种竭力改造社会的教育实践。作为教育理论,它猛烈抨击传统教育的弊端,提倡采用提问式教学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作为教育实践,它直面教育的政治性,将教育作为实现被压迫者真正解放的有效手段。

二、毛泽东的解放教育思想

运用解放教育学的视角进行观察,则可以令人惊讶地发现,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不仅包含解放教育学的全部真谛,而且有着更为丰富的实践内容。

(一)个性解放教育——从反封建家长制开始

毛泽东少年时期就表现出极强的个性独立意识,敢于公然向父亲、私塾老师以及宗族族长发起挑战,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骇人听闻的。

1.对父亲权威的“反叛”

毛泽东的反抗精神与后来的解放意识,不得不说与父亲的权威有着直接关联。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所言,“中国儿童从小第一次对于权威的感知和对于‘政治’的体验就是严厉和全能的父亲形象”。^[12]毛泽东父亲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正因如此,他从小与父亲的关系就比较紧张。最典型的就是毛泽东13岁那年的一件事:

“有一次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来,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进一步,我就要跳下去……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13]

后来毛泽东回忆道:“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14]¹⁰⁸这是他与父亲发生的一次“正面冲突”,也是向父权社会发起的一次直接挑战。这个事件发生虽然有其偶然性,“这归根结底是由父亲的坏脾气惹起的理所当然的抗拒”,^[15]但这确实也彰显了少年毛泽东初步的“反叛意识”。

与父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母亲具有博爱淳朴的风范,对少年毛泽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毛泽东母子经常周济贫困,但屡屡遭到父亲反对。^[14]¹⁰⁷毛泽东对父亲的反抗策略也发生了变化,并初步构建了自己的反抗模式:“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办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反驳他。”^②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14]¹⁰⁷尽管他憎恶父亲,但是父亲的“严厉、勤奋、实干、执著的上进心和对空洞理论的不关心”,^[15]却都被毛泽东继承下来,与后来务实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斗争不无关系。

2.对教师权威的“挑战”

如果说对父亲的反抗是一种本能叛逆,那么对教

师权威的挑战则是一种自觉意识萌芽。毛泽东八岁进入一所私塾(1902)学习四书五经,启蒙老师是邹春培,但那时的毛泽东对这些并不感兴趣。^[16]⁶毛泽东之所以对儒学较为反感,主要是因为“孩子们被要求鹦鹉学舌般地大声朗读那些晦涩的陈词老调,他们摇头晃脑宛如念经的和尚”,^[16]⁷所以他对经书里有关秩序和礼仪的清规戒律要求人们无条件盲从表现出不满。这种不满使得毛泽东开始接触一些其他的书籍。他说:“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他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14]¹⁰⁸

邹春培也和当时许多塾师一样,教学生背诵那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背诵时,邹春培老师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学生背着他站立,气氛相当紧张。初入学的儿童望而生畏,往往已熟读的课文也吓得背不出来。轮到泽东第一次背书时,他不按规矩肃立,依然端坐在自己的课桌上。邹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不站起来?”他回答道:“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背。”^[17]¹⁷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传统教育的典型模式:教学内容晦涩难懂;教学方法单调刻板即背诵加体罚;教师为了维护师道尊严,师生关系非常紧张乃至对立。这种传统教育模式决不容许“被压迫者”有丝毫反抗。但少年毛泽东是个例外,“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这是毛泽东平等意识觉醒的反映。另一则“逃学”事例也以成功而告终,^[14]¹⁰⁶但有一次因为上课偷读《水浒传》被先生赶出了私塾。^[18]

3.对宗族权威的“反抗”

1910年,那年毛泽东17岁,长沙饥民发生暴动,同样的事例也发生其他地方。此时,毛泽东开始用行动为受压迫者进行抗争。

长沙饥民暴动虽被镇压,但暴动的余波仍在冲击着湖南各地,韶山也出现了“吃大户”的风潮。当时韶山农民同样缺吃,而毛族族长毛鸿宾却把族上的积谷一百多担私下高价卖给米商,牟取暴利,被族人发觉。外号“花脸”的佃农毛承文领头,要求开仓平糶。毛鸿宾依仗权势,将“花脸”捆绑起来,召集全族老小,打开祠堂门,准备对毛承文进行惩罚。贫苦的族人,见此情形,都忿忿不平。这时,血气方刚的毛泽东闻讯赶到祠堂,当众列举事实,指出违犯族规的,不是要求平糶的毛承文,而是私卖积谷的毛鸿宾。经过大家辩论,支持毛承文的越来越多。毛鸿宾理屈词穷,终于被迫松了毛承文的绑,并答应交还私自卖出的积谷。这件事使族长的权威受到沉重打击,毛泽东也因此韶山冲一带出了名。^[17]¹⁵⁻¹⁶

正如弗莱雷所言,“觉悟是意识上的批判的发展”,“觉悟是一种历史的介入”。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不仅广泛涉猎传统儒家各派思想,也开始接触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等西方哲学思想,此时思想的激荡促进了他的思想快速成长。此时,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密切关注社会形势发展,悉心探寻拯救国家和改造社会的道路。^{[17] 61-68}

(二) 妇女解放教育——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

妇女解放是毛泽东最早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关注最为持续的问题之一。“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即一个现代的国家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崛起前会对妇女参与社会的公正问题有如此持久的关注。”^{[19] 22-23}之所以如此,这与他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毛泽东14岁那年,父母为其包办婚姻一事令他深恶痛绝。^[20]但对他内心震动最大的还是1919年发生的“赵五贞自杀事件”^③。长沙《大公报》为此先后发表了20多篇文章。毛泽东在12天中连续发表9篇文章,^[21]强烈抨击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与残害,指出赵五贞的自杀根源于黑暗的社会制度,并号召人们向“吃人”的旧社会发起进攻。1927年,他在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四权理论”,认为女子除了与男子同受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22]自此,他开始把妇女解放同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23]

除了在妇女解放思想上的探索之外,毛泽东还以极大热情投入妇女解放教育实践。他极力主张通过加强教育宣传和举办女子学校的途径推动妇女的觉醒,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苏区妇女解放教育运动。^[24]毛泽东亲自分派干部在福建新源苏维埃根据地建立了8所女子学校和女子培训班。不久,福建各个地方都开始建立起女子学校和训练班。^{[19] 26}有史料记载,在江西兴国县1000多个夜校的15740名学生中,妇女竟达10752人,约占70%。识字组员22519人中,妇女达13519人,占60%。^{[25] 173}在创办苏维埃干部学校的计划中,要求妇女参加人数达到1/3。^{[25] 105}不仅如此,苏区还把妇女教育与号召妇女自我解放结合起来,实现自我革命;把妇女教育同改革封建婚姻制度结合起来,实现家庭革命;把妇女教育与批判封建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实行社会革命。从自我革命到家庭革命再到社会革命,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总之,妇女解放教育运动开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广大妇女的觉醒,进而认识到自身受压迫的地位,最终投入到自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大潮之中。

(三) 大众解放教育——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

因为妇女问题非常独特,故专门论述,但它也属于大众解放教育的一部分。不过这里的大众专指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毛泽东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不无感慨地说:“依据国家状况,社会中坚力量实是大数目的工人和农民,但他们没有机会受到教育,觉悟不能提高,知能不能增进,问题实在太严重了!”^[26]当时的中国该何去何从,许多仁人志士都发出了自己的呼喊,晏阳初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愚、穷、弱、私”,并寄希望通过平民教育促成劳苦大众的觉醒与解放。此时,受到各种思想冲击的毛泽东也一度有“教育救国论”的思想倾向。

与晏阳初不同的是,毛泽东在早年把平民教育的重心放在了工人教育方面。1917年秋天,毛泽东被推选为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他倡议在一师的附属初级小学内创办工人夜学,吸收附近的穷苦工人入学。当时的夜学招生广告写得非常通俗生动。^[27]1921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在他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里面写道:“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研究各种学术,并注意劳动,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28]在湖南自修大学的《入学须知》上这样写道:“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实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28]这就说明毛泽东开展的平民教育的核心要旨在于使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剪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28]为民族解放而服务。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担任所长,从事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教育。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群众教育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农村。在教育原则上,毛泽东主张采取灵活多样、符合农民生活实际、自主自愿、树立典型、物质嘉奖等原则开展教育活动。^{[29] 116}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兴起办学的高潮,冬学、读报识字组、夜校等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毛泽东主张在教学内容上非常讲究实用,^{[29] 116}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29] 117}不得不说,毛泽东强调学习者主体地位的教育思想与杜威的教育精神是一致的^④。后来弗莱雷的扫盲教育运动也与此有诸多相似之处。

(四) 干部解放教育——为了锻造解放的革命斗士

解放实践的成功必定离不开革命的斗士,毛泽东在干部教育方面也作出了许多创举,其中最值得称赞的当属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美国记

者斯诺将其称为世界上唯一的“窑洞大学”。1936年6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但在7月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偷袭,学校被迫迁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学员们把山崖上供奉元始天尊的石洞改造成校舍。毛泽东在一次讲课的时候幽默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着当代社会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30]这一席话给学员们莫大的鞭策。1937年1月20日,抗大第二期在延安开学。1937年3月,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把它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规定下来。1937年4月,抗大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在抗大办学期间,毛泽东创立的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以及“活”的考试等教学方法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是非常先进的。毛泽东竭力反对注入式教学,坚决主张采取启发式教学。他认为,注入式教学的根本特点就是“灌”,即把书本上的现成知识灌给学生,这样就容易束缚学生的个性发展。所以,毛泽东每次给抗大学员讲课,都列举大量生动的实例,如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以“毛驴上山”作比喻阐明逼蒋抗日的道理。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日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他,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31]这些精辟见解和形象比喻使广大学员豁然开朗。显然这种启发式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与弗莱雷的“对话式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知识分子思想解放教育——关于世界观“改造”的实践

知识分子是民族走向解放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对其特殊性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因而具有很强的革命性,而且他们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份,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因此需要“团结”。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带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习气,有时对待革命又具有一定的动摇性,因此需要“改造”。所以,知识分子既是解放的先锋又是解放的对象。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待知识分子坚持一贯的政策,“第一是团结,第二是批评、教育和改

造”,^[32]只不过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而已。

在思想改造内容上,毛泽东概括为三点:一是立场的转变。即通过思想改造确立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态度,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亦即解决“一条心”还是“两条心”、“半条心”的问题。^[33]⁴⁴⁹二是思想感情和思想意识的转变。因为知识分子有一种气味,就是“不愿到农村中去,轻视农村”,^[33]³⁰⁶所以要通过思想改造克服知识分子的那些缺点和不良习气,确立热爱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三是世界观的转变。毛泽东说:“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33]⁴⁰⁹因此要通过思想改造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增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自觉性。

在具体改造方法方面,第一,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二,投身革命和建设实践,向工农群众学习;第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33]³⁷¹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他们投身民主革命和国家建设大潮的积极性,但操作失误后也会挫伤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

(六)学校教育的解放——从“分数”崇拜中解放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进行教育改革一直是毛泽东关注的核心问题。他在1964年指出:“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员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出百分之五十,其它就说不知道,和学员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都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就是教员。”^[34]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解放教育思想贯穿在教育各个方面。无疑,个性解放是其批判意识与解放意识产生的基础,而妇女解放、大众解放、干部解放、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和学校解放都是其教育实践领域。而且他还关注到世界上受压迫人民的解放,“三个世界”理论就是具体体现,显然中国革命成功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

三、毛泽东作为解放教育学先驱的地位

在毛泽东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实际行动,都蕴含了解放教育学的基本内涵,这

说明他事实上就是在扮演解放教育学先驱的角色。

从理论上讲,弗莱雷的解放教育思想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他直接区分为压迫者和受压迫者,提出通过“对话”、“交流”、“批判”、“反思”、“行动”实现教育的解放,最终达致真正的人性解放。而毛泽东则用行动证明了压迫者和受压迫者的存在,从而展示了一个从个性解放到妇女解放、大众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解放实践系列,真实地体现了弗莱雷的“教育即政治”的逻辑。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罗斯所言:“毛的教育思想与杜威和保罗·弗莱雷的教育思想的精神是很一致的。”^[35]这一点也证明了弗莱雷解放教育思想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从时间上看,弗莱雷于1965年完成他的第一部著作《作为解放实践的教育》,在该书中,弗莱雷总结了扫盲教育的工作经验,提出了“解放教育”的思想。1969年,弗莱雷到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实用主义哲学观使他对教育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美国归来后,他撰写并出版了《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该书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其解放教育的思想体系。相比之下,毛泽东的解放教育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五四”前后就已经初步形成,比弗莱雷早了将近半个世纪。

从社会背景看,弗莱雷的解放教育思想产生于他所生长的不平等的社会环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极大地推动了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弗莱雷之所以深受古巴革命核心人物切·格瓦拉的影响,这与古巴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无关系。因此,中国革命成功对弗莱雷解放教育思想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理论渊源上看,毛泽东的解放教育思想早期深受中国顾炎武的“经世致用”、颜元的“习行哲学”、康梁的“主变哲学”、杨昌济的“英才教育”及西方的康德、黑格尔、罗素、杜威等思想的影响,^{[17] 27-179}后来则主要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毛泽东思想开始影响世界,包括许多著名思想家,如法国哲学家萨特、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和福柯等。^[35]如果仔细研究《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就会发现,弗莱雷的解放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可谓“蔚为壮观”,包括萨特的“意识与世界同在”、福柯的“规训”、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胡塞尔的“背景直觉”、弗洛姆的“恋死癖世界观”、格瓦拉的“革命是爱的行为”等等。^[11]推知,毛泽东思想通过萨特、福柯等思想家也影响了弗莱雷。不仅如此,弗莱雷还直接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灵感。他说,“我之所以钻研萨特和穆尼耶、埃里奇·弗洛姆和路易斯·阿尔都塞、奥尔特加·

加塞和毛泽东、马丁·路德·金和切·格瓦拉、乌纳穆诺和马尔库塞”,就是为了用这些人的远见卓识来铸就一种真正属于自己并能对拉美的具体现实产生影响的教育观点。^{[4] 2}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教育实践不仅是中国教育学发展的一份独特财富,而且为国际上解放教育学思想的产生确立了一个典范。因此,毛泽东作为解放教育学的先驱地位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在弗莱雷看来,在斗争的初始阶段,被压迫者往往不是为了解放而进行斗争,而几乎是为了获得压迫者或次压迫者的地位,这正是黑格尔一再强调的“主奴结构”的社会循环。弗莱雷认为,这种斗争并不是真正解放意义上的行动。

有一次,毛顺生因山林纠纷与人打官司,对方引经据典,把无理说成有理。毛顺生却有理说不清,眼睁睁让人家占去一片山地。这也是毛顺生一度让毛泽东学习四书五经的重要缘由。毛泽东采用“引经据典”策略即与此事有关。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城的“赵五贞自杀事件”。赵五贞,长沙市南阳街眼镜作坊赵某之女,年方21岁,“颇知书识字”。经父母包办,被许配给长沙柑子园古董商吴某之子为妻。五贞极不满意这桩婚事,多次反抗未果,故于出嫁之日,在花轿中割颈自杀,史称“赵五贞自杀事件”。请参考:唐娅辉,赵五贞事件与毛泽东早期妇女解放思想[J].史学月刊,1988(2):54.

1920年10月,美国杜威来长沙讲演,当时毛泽东应报社之邀任记录员,事后他这样评价杜威的教育思想,“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请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96.

参考文献

- [1]张聪.毛泽东早期反抗教育思想来源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2:2.
- [2]丁钢.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162-167.
- [3]彭正梅.解放和教育——德国批判教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
- [4](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顾建新,赵友华,何曙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5]李育球.解放教育何以可能——保罗·弗莱雷教育思想的解读[J].教育学报,2010(3):20.
- [6](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7.
- [7]罗岗.“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J].当代作家评论,2004(5):124.
- [8]Ira Shor, Paulo Freire. A Pedagogy for Liberation [M].Massachusetts: Bergin and Garvey Publishers, Inc.1987: 48.
- [9]Carlos Alberto Torres Novoa. La Praxis Educativa de Paulo Freire[M]. Editores Gernika, S.A. 1978:130,112.
- [10]黄志成.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弗莱雷解放教育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2.
- [11]江发文.被压迫的底层与底层的解放——读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J].社会学研究,2009(6).

- [12]翟韬. 家庭教育与中国革命——白鲁恂对中国政治的“另类”解读[J]. 文化纵横, 2009(4).
- [13](英)菲力普·肖特. 毛泽东传[M]. 全小秋, 杨小兰, 张爱茹, 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30.
- [14](美)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M]. 董乐山, 译.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79.
- [15](日)竹内实. 毛泽东传记三种[M]. 韩凤琴, 张会才, 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6.
- [16](美)罗斯·特里尔. 毛泽东传[M]. 胡为雄, 郑玉臣,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17]汪澍白, 张恒慎.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 [18]黄丽镛. 毛泽东读书实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19-21.
- [19](美)若克斯娜·帕思娜卡. 绿色政治时代中的毛泽东与妇女问题: 一些批判性反思 [J]. 张孝芳, 译.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4).
- [20]陈廷一. 毛氏三兄弟——三兄弟与共和国奠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25-27.
- [21]丁娟. 试述毛泽东关于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思想[J]. 妇女研究论丛, 1993(4): 9.
- [22]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31.
- [23]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51.
- [24]袁旭川.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两
次转变[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1(1): 69.
- [25]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1927-1935)[C].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 [26]周世钊. 湘江的怒吼[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594.
- [27]毛泽东. 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94.
- [28]金冲及. 毛泽东传 1893-1949(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79.
- [29]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30]张伟. 抗大教育长罗瑞卿[N]. 人民政协报, 2008-08-28.
- [31]何长工. 难忘的岁月[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159.
- [32]毛泽东. 毛泽东论教育[M]. 第三版.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207.
- [33]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 [34]毛远新和伯父的谈话首曝教育观[EB/OL]. (2011-07-12)[2013-10-7]. <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9/226343/15138713.html>.
- [35](美)安德鲁·罗斯. 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政治的影响[J]. 郑洛,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07(8).

收稿日期 2013-10-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大学制度原理与中国大学模式探索”(11JJD880021)

作者简介: 王洪才, 1966 年生, 男, 汉族, 河北永年人, 教育学博士,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解德渤, 1987 年生, 男, 河北衡水人, 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